

编后记

AFTERWORD

本辑刊载的文章分为两大板块：“圣经在中国”和“多样性圣经研究”。

论及圣经在中国的际遇时，本刊尝试立足于中国的腹地河南思考问题，特别关注河南文化与圣经研究的关联性。其中首篇论文指出，河南的民间基督教文化为河南作家进行圣经书写提供了基础。以周大新、李佩甫、刘震云、阎连科为代表的河南当代作家摸索出重写圣经的两种模式：一是贴近圣经的神圣性，从理想性和现实性两个层面与圣经构成对话，从而撷取多种圣经元素，丰富了作品的意义空间；二是立足于河南本土文化，从世俗性层面瓦解圣经的神圣性，将异域宗教经典元素融入乡土文化和乡土叙事之中。作者认为，河南当代作家的圣经书写为利用外来资源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参考。

另一篇论文聚焦于20世纪初期在华天主教印书馆出版的鼓词作品，尤其费金标的《圣教古史小说鼓词》，以其中的《创世纪》为个案，从叙事语言、叙事结构、情节增删、矛盾冲突等方面条分缕析地剖析了作者改编圣经的策略，指出其如何以中国传统鼓词艺术的本土化手法改造圣经故事，揭示圣经蕴含

的劝惩义理，涉及天主教中国化的核心命题。

随后数文转而聚焦圣经汉译及其传播问题。周作人撰写的《哀弦篇》曾引用两节《耶利米书》和七节《耶利米哀歌》，研究表明，那些引文是周作人对施约瑟所译《旧约全书》的修改。这一结论对于追溯《哀弦篇》的材料来源、周作人的圣经阅读史、施约瑟官话译本的接受史，均有某种学术价值。《艾儒略的福音书译述策略》一文认为，艾儒略以其“西来孔子”的理论修养与渊博学识，在《天主降生言行纪略》中对福音书进行了变通性译述，将耶学经典与中国传统文化衔接起来，为明末的耶儒跨文化对话奠定了基础。《盛名之下：王韬在“委办本”中的实际作用》一文则力图还原“委办本”汉译细节的史实，剖析王韬的语言能力、信仰状况和翻译态度。作者对勘多种相关经文，较为允当地评价了王韬在“委办本”翻译中的实际作用。在这组论文末尾，也有学者运用美国圣经公会档案等史料，追踪海格思主持下美国圣经公会在华的经营活动，揭示出清末民初圣经在中国传播的某些史实。

继而，首先呈现于“多样性圣经研究”栏目的，是对《路得记》2:3-17之“好客”主题的解读。其作者别出心裁地提出，波阿斯因雅威的介入而视路得为神圣却饥饿的异乡人，为之提供了安全的处所和充足的饮食；其好客是路得即将获得“完满报偿”的阶段之一，预示她的异乡人身份最终消解，她甚至将会作为第二利亚和拉结为以色列家奠基。继之是《“自我称义”与“算为义”》一文，作者通过解读《路加福音》18:9-14所载“法利赛人与税吏的比喻”，逐层深入地探讨了“义”在早期基督教传统中的含义。如果有人发问：“谁是迈蒙尼德心中最完善的先知？”答案未必一目了然。然而针对于此，有学者

却做出回答：迈蒙尼德在《迷途指津》里以不同的方式暗示，亚伯拉罕较之摩西乃是更完善的先知。卢梭的《以法莲山的利未人》貌似对《士师记》末后三章的改写，实系一则历史哲学寓言。本栏目的专论表明，该文事实上是文明从初兴到败坏再到最终救赎的历史叙事。在此栏目的最后，亦有学者聚焦于《次经》灵肉观对《新约》的影响，认为这项考察有助于探讨基督教灵肉观的二希思想来源，也有助于了解犹太—基督教哲学灵肉观的同源性、整体性和差异性。

本辑末尾传递了若干学术动态：“文明互鉴与古代近东经典研究学术研讨会”召开、《国外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研究》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召开，以及“原文新约”应用程序的元素和愿景。